

# 生存安全与本体安全： 欧洲小国是否加入北约的政策逻辑<sup>\*</sup>

孙西辉 邓仕琴

**【内容提要】**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安全秩序加速重组，北约扩员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既有研究多从“大国决定论”出发，强调美国主导或美俄博弈的结构性作用，相对忽视了小国在界定威胁、身份动员与制度选项取舍中的能动性。本文从小国视角出发，区分“生存安全”与“本体安全”概念，构建一个阶段性与条件性相结合的“临界—强化”解释机制，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设。本文以爱尔兰、奥地利、瑞典、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为例，基于比较研究法与过程追踪法进行检验。爱尔兰的案例表明，当外部威胁未被决策层界定为触及国家存续性威胁时，结盟难以进入政策议程；奥地利与瑞典的案例表明，当生存安全威胁已被决策层感知但未被界定为触及国家存续性威胁时，本体安全强化了瑞典的结盟动机并推动其加入北约，奥地利则因为本体安全的抑制作用仍维持中立政策；波罗的海三国与芬兰的案例揭示，当外部威胁被决策层界定为国家存续性威胁时，小国无论其本体安全状况如何，均倾向于结盟。本文据此揭示存续压力与身份建构交织下的小国是否谋求加入北约的政策逻辑，补充北约扩员的“小国解释”路径。

**【关键词】** 北约扩员 生存安全 本体安全 欧洲安全秩序  
小国的结盟政策

**【作者简介】** 孙西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邓仕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博士研究生。

---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路径下中国共产党国际关系思想的学理化研究”（24AGJ001）的阶段性成果。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称“北约”）是美苏冷战的产物，其设立初衷在于强化欧洲与北美国家在军事与政治层面的协作与共同防务。冷战结束后，北约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在新的安全环境中持续调整定位，拓展职能边界，并通过多轮扩员扩大战略影响力。尤其在当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北约的政策选择与演化路径持续牵动欧洲安全秩序，并对全球安全格局产生结构性影响。一方面，北约近年来在东亚地区日益扩展业务并提升影响力，不断与日韩加强合作，对中国周边安全产生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北约东扩是俄格战争和俄乌冲突爆发的安全与政治根源，在俄乌冲突长期化背景下北约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的概率增大，爆发大规模战争和核战争的风险不容忽视。冷战结束以来，北约已完成六次扩员，且加入的均为欧洲小国<sup>①</sup>，如捷克、匈牙利和波兰（1999），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2004），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2009），黑山（2017），北马其顿（2020），芬兰（2023）和瑞典（2024）。综合来看，北约扩员符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俄博弈的需要，也体现了欧洲小国追求集体安全和提升国际地位的意愿和决心，是相关大国和小国共同作用的结果。现有研究多从大国尤其是美国主导的视角解释北约扩员机制，“大国决定论”占据主流，较少深入讨论小国的能动性。本文在承认大国主导作用的前提下，以小国安全诉求为切入点，聚焦欧洲小国“加入或不加入北约”的政策选择逻辑。

## 一 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北约扩员不仅显著改变了欧洲地缘政治格局，而且牵动冷战后的大国关系和国际安全，引发各界密切关注。学术界关于北约扩员动因的研究成果异常丰富，相应观点可归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美国主导论。该论点强调美国在推动北约东扩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一方面，美国将北约视为其霸权扩张和控制欧洲的工具，通过北约扩张提

---

<sup>①</sup> 学术界对小国没有统一的界定，本文采用“三维度六指标”体系划分国家大小/强弱。根据这一划分原则、标准和方法，这些欧洲国家均为小国。参见孙西辉、金灿荣《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马来西亚的中美“平衡外交”》，载《当代亚太》2017年第2期。

升战略竞争优势，抢占后苏联空间<sup>①</sup>。另一方面，通过北约扩张遏制俄罗斯甚至是中国，确保自身在欧洲军事力量的存在，建立由美国领导的欧洲安全格局和维持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及利益<sup>②</sup>。为应对中国实力的提升，北约开始借助讨论涉华议题强化其战略合法性<sup>③</sup>。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及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等人主张继续扩大北约<sup>④</sup>，将北约视为确保欧洲稳定、应对俄罗斯潜在威胁并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核心工具<sup>⑤</sup>。北约东扩有助于增强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也为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由市场、民主价值观和西方领导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制度支撑。此外，美国主导北约东扩也有经济层面的考量，意在吸纳中东欧国家加入其中并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向西方政治和经济体制转型<sup>⑥</sup>。随着中东欧国家陆续加入北约，美国在向中东欧国家推销本国商品的同时还将这些国家的能源、资源置于其控制之下<sup>⑦</sup>。北约东扩促进这些国家实施市场经济改革，助推美国全球经济战略的实施，巩固其所谓的“全球领导地位”。因此，美国将推动北约东扩视为促进民主、市场改革目标与传统地缘战略利益相结合的有效工具<sup>⑧</sup>。

① 徐秀军 《北约扩张的进程、动因及可能影响?》，载《人民论坛》2022年第14期。

② 苗华寿 《北约东扩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载《和平与发展》2003年第1期；叶自成 《北约东扩与美俄中的地缘政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1期。

③ 吴昕泽、王义桅 《北约再转型悖论及中国与北约关系》，载《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10期。

④ John Lewis Gaddis, “History, Grand Strategy and NATO Enlargement”, *Survival*, Vol. 40, No. 1, 2007, p. 148.

⑤ 刘靖华、牛军、姜毅 《论北约东扩——地缘政治与文明特性的双重分析》，载《美国研究》1997年第3期〔美〕伊万·迪内夫·伊万诺夫 《转型中的北约：新联盟、新任务和新能力》，赵文亮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126页；Michael Mandelbaum, “Preserving the New Peace: The Case Against NATO Expansion”,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3, 1995, pp. 9-13; Charles-Philippe David and Jacques Lévesque eds, *Future of NATO: Enlargement, Russia, and European Security*, Montreal, Canada: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13; Ronald D. Asmus, *Opening NATO’s Door: How the Alliance Remade Itself for a New E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6.

⑥ 李海东 《克林顿政府与北约东扩》，载《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

⑦ 周平 《北约东扩与美国》，载《理论月刊》2005年第9期。

⑧ 陶文钊 《北约东扩与美俄关系（1993~1997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0期。

第二，俄罗斯—北约互动论。该观点强调北约扩员并非单向推进，而是俄罗斯—北约在威胁认知、反制行动与安全承诺之间持续互动的结果。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认为，北约东扩本质上是西方对俄罗斯潜在复兴的主动遏制<sup>①</sup>，东欧国家因历史记忆创伤和地缘邻近性将俄罗斯视为生存威胁，迫使北约通过扩员构筑“防御线”<sup>②</sup>。这一观点在实证研究中得到支持，萨洛特通过梳理冷战末期档案，证实北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扩员决策中，已将防范俄罗斯帝国野心复苏列为关键政治目标<sup>③</sup>。“威胁平衡”理论进一步细化该逻辑，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前线国家”因俄罗斯军事现代化和混合战争产生高度不安全感，其加入北约的诉求直接推动北约防御前沿东移<sup>④</sup>。北约实现多轮扩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的威胁认知<sup>⑤</sup>。俄罗斯在冷战后对其传统势力范围的捍卫立场，以及其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地区的强硬姿态，激化了东欧国家对安全的担忧和焦虑<sup>⑥</sup>。梅尔克索认为，俄罗斯与波罗的海三国的二战历史叙事呈现根本性对立，对作为苏联法定继承国的俄罗斯而言这场战争是“伟大卫国战争”，对波罗的海三国来说则意味着国家独立地位的丧失、民族认同的瓦解以及生存意义的剥夺<sup>⑦</sup>。拉诺斯卡进一步发现，中东欧国家将“历史创伤叙事工具

① John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5, 2014, pp. 77–89.

② Mark Kramer, “The Myth of a No-NATO-Enlargement Pledge to Russ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2, No. 2, 2009, pp. 39–61; Mälksoo Maria, “The Memory Politics of Becoming European: The East European Subalterns an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5, No. 4, 2009, pp. 653–680.

③ Mary Elise Sarotte, *Not One Inch: America, Russia, and the Making of Post-Cold War Stalemat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14–16.

④ Alexander Lanoszka, “Russian Hybrid Warfare and Extended Deterrence in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2, No. 1, 2016, pp. 175–195.

⑤ Sufyan Akhlaq, Muhammad Arslan, Qasim Shahzad Gill and Ghulam Mustafa, “NATO Enlargement and the 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A Cri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Social & Organizational Matters*, Vol. 3, No. 2, 2024, pp. 189–203.

⑥ Samuel Charap and Timothy J. Colton, *Everyone Loses: The Ukraine Crisis and the Ruinous Contest for Post-Soviet Eurasia*, London: Routledge, 2017, pp. 55–60, pp. 91–95, pp. 131–141.

⑦ Mälksoo Maria, “Liminality and Contested Europeanness: Conflicting Memory Politics in the Baltic Space”,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Routledge, 2016, p. 6.

化”，如立陶宛公开苏联占领档案，塑造集体威胁认知，倒逼北约将俄罗斯列为“系统性挑战”<sup>①</sup>。当然，也有学者对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如沃尔弗斯等人认为，美俄关系恶化源于北约中心性引发的结构性矛盾，而非单纯东扩；双方基于修正主义的安全需求陷入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对抗螺旋，过度强调俄罗斯威胁可能陷入“自我实现的预言”，反而刺激俄罗斯采取更为强硬的反制措施<sup>②</sup>。俄罗斯在面临北约扩张带来的地缘安全威胁时采取反制措施，促使北约向东扩张，从而形成了一种安全困境<sup>③</sup>。俄罗斯和北约的安全互动可以结合杰维斯的“螺旋模式”概念来理解。俄罗斯2000年提出“现实遏制核战略”及2008年的俄格战争，被北约解读为带有进攻性的修正主义意图。在此背景下，北约加速拉拢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尝试刺激俄罗斯用武力进行干涉，由此在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形成“反制—东扩—再反制”的恶性循环。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北约东扩作为关键诱因催化了与俄罗斯的结构对抗升级，俄罗斯彻底放弃对西方的幻想和希望，回到以武力解决问题的老路<sup>④</sup>。当前的俄乌冲突加剧了北约对俄重建“势力范围”的战略猜忌，被北约解读为“扩张性威胁”，使芬兰和瑞典的安全焦虑加剧，主动申请加入北约，并推动北约在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对俄前沿地带升级军事存在。上述事实印证了关于俄军事行动强化北约“防御共识”的观点，但俄学者萨夫兰丘克认为这是北约将俄罗斯的被动防御曲解为“主动扩张”<sup>⑤</sup>。此外，俄罗斯2022年对乌克兰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彻底瓦解了《北约俄罗斯基本文件》建立的战略安抚框架，导致北约内部对俄“接触派”失势，转而采取加速吸纳新成员、在罗马尼亚建设

① Alexander Lanoszka, “Russian Hybrid Warfare and Extended Deterrence in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2, No. 1, 2016, pp. 175–195.

② Andrey A. Sushentsov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Tragedy of US–Russian Relations: NATO Centrality and the Revisionists’ Spiral”,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7, No. 3, 2020, pp. 427–447.

③ John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5, 2014, pp. 77–89.

④ 吴文成 《从科索沃战争到乌克兰危机：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战略觉醒”》，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3期。

⑤ Ivan Safranchuk, “US and NATO Strategy in Ukraine: Scenarios for Relations with Russia”, *Cuadernos Iberoamericanos*, Vol. 10, No. 4, 2023, pp. 35–43.

超大型军事基地等遏制性措施，这标志着北约从合作幻想回归遏制优先的东扩逻辑<sup>①</sup>。这种多维度的互动机制揭示，由于单边安全诉求与战略误判的叠加，俄罗斯对北约的反制措施被北约解读为“修正主义威胁”，进而刺激北约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吸纳更多东欧国家，形成“行动—反应”螺旋<sup>②</sup>。有学者从中东欧国家的战略重要程度和面临威胁的重大程度这两个变量出发讨论了北约东扩的次序问题<sup>③</sup>。

第三，北约吸引论。该论点聚焦于北约的安全保障、经济合作与外交关系等网络功能，认为北约的吸引力源于其组织结构和集体安全机制。作为一个多国合作的防卫联盟，北约不仅拥有强大的核武器和常规军力，还通过公约给予成员国集体防御的承诺，即任何成员国遭受武装攻击时，其他成员国必须视其为对全体缔约国的攻击。此外，北约成员国共享安全情报，加强防务合作，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在国际事务中协调立场。随着国际安全问题日益多样化，北约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的功能也对其他国家具有吸引力。如北约在打击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和能源安全等领域的能力提升，使其超越传统军事联盟的角色，成为应对综合性安全挑战的平台<sup>④</sup>。北约不仅是一个军事联盟，还是一个促进成员国相互支持和协调的政治与经济平台<sup>⑤</sup>。因此，许多欧洲国家将加入北约视为向西方民主体系靠拢的重要标志和巩固国内政治稳定以及防止极端主义威胁的有效途径<sup>⑥</sup>，加入北约意味着能够融入这一集体安全机制与合作网络，提升自身的国际

① “Romania Launches Expansion of Air Base Near Ukraine”. <https://www.defensenews.com/global/europe/2024/06/13/romania-launches-expansion-of-air-base-near-ukraine/>，访问时间：2026 年 2 月 4 日。

② 杨雷、张莉霞 《冷战后俄罗斯与北约安全困境的形成与升级》，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 年第 2 期。

③ 周建仁、欧高荣 《冷战后北约东扩次序的逻辑》，载《国际政治科学》2024 年第 4 期。

④ Sascha-Dominik Bachmann, “Hybrid Threats, Cyber Warfare and NATO’s Comprehensive Approach for Countering 21st Century Threats—Mapping the New Frontier of Global Risk and Security Management”, *Amicus Curiae*, Vol. 88, 2012, pp. 14–17 “Annex I: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in the report titled *NATO’s New Strategic Concept*, September 1, 2022, pp. 59–72.

⑤ Alexandra I. Gheciu, *NATO in the “New Europ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93.

⑥ Frank Schimmelfennig, *The EU, NATO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 Rules and Rhetor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7–51.

地位，并获得强有力的安全保障<sup>①</sup>。

现有研究为我们在大变局时代理解北约扩容的动因提供了良好基础，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研究视角不够全面。相关研究或遵循大国决定论的思维逻辑，或聚焦北约自身的功能以论证其东扩的内生性，忽视了在大国博弈时代小国的安全诉求对北约东扩的塑造作用。二是研究的理论化程度有待提高。既有研究大多采用传统的归纳总结方式，即便提出某个理论视角，也缺少基于理论构建的合理分析框架，相关分析的解释力不够强。三是整体研究与个案分析的结合不够。已有研究基本上笼统地总结北约东扩的原因，但对涉及具体国家的个案分析不够细致，有些研究专门探讨具体国家加入北约的原因，但未从整体上探讨各国加入北约的原因，导致整体研究与个体分析割裂。本文将基于已有研究，聚焦小国安全关切视角，构建欧洲小国是否加入北约的政策选择分析模型和研究假设，并结合相关国家的实践进行多案例对比分析与验证。

## 二 研究思路与理论建构

本文尝试从学理性研究路径出发，侧重机制化探讨而非政策描述。本部分主要说明聚焦小国视角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全面阐明核心概念的内涵与衡量指标，构建分析模型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 （一）聚焦小国视角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聚焦大国视角对北约扩员有重要解释力，但也有一些局限性。一方面，“大国中心”解释路径将小国简化为被动接受安全供给的客体，忽视其在联盟政治中的主体性；另一方面，生存安全威胁的单向度解释难以揭示后冷战时代安全内涵的复合化特征，完善对北约扩员的双向动因考察需要关注小国视角。

第一，关注小国视角符合地缘政治现实。北约扩员是安全供需的动态适配过程，冷战后的小国已从安全消费者转型为具有议价能力的特殊行为体。北约制度设计中的“成员国自愿原则”从法理层面确立小国诉求的程序性地位，扩员进

---

<sup>①</sup> Stuart Croft, "Guaranteeing Europe's Security? Enlarging NATO Aga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8, No. 1, 2002, pp. 97-114; Ryan C. Hendrickson, "NATO's Visegrad Allies: The First Test in Kosovo",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Vol. 13, No. 2, 2000, pp. 25-38.

程的阶段性特征印证小国战略自主性提升。乌克兰危机后出现的“反向安全化”现象，更凸显小国通过国内政治进程反向塑造联盟议程的能力。这些事实要求研究者超越“大国主导—小国依附”的线性认知，关注小国的安全诉求。

第二，聚焦小国视角可以丰富研究路径。现有研究中的结构现实主义路径强调霸权护持与战略挤压的二元对立，自由制度主义路径剖析北约制度弹性，建构主义路径侧重联盟身份认同的再生产。这些理论化路径有助于深化对北约转型的认知，却普遍关注大国战略互动，对小国决策机制的探讨明显不足。学术研究的“中心—边缘”叙事惯性，难以解释波罗的海三国与白俄罗斯的联盟选择差异，也无法揭示北欧中立国战略转向的深层动因。本文通过构建复合安全分析模型，将小国从国际关系的背景板移到焦点位置，以丰富北约扩员的解释路径。

第三，重视小国视角能够准确解释其行为。在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中小国家普遍采用多维度的安全保障策略。有些国家在强化军事同盟的同时维持多元经济合作，也有国家在意识形态归属与地缘利益间寻求平衡。此类行为看似矛盾，实则是小国在复合安全框架下的理性选择，它们通过构建军事、经济、身份的多重保障机制实现风险分散。只关注大国行为这个单一维度，将无法准确理解国际关系现实和小国的行为。聚焦小国视角的安全研究是对小国能动性的正名，也是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主权平等原则的学术回归。

## （二）核心概念：生存安全与本体安全

国家安全是国家不受各方面威胁危害的状态<sup>①</sup>，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根据不同维度或标准，国家安全有不同的分类，如基于安全威胁来源可分为内部安全问题和外部安全问题，根据安全所属领域可分为传统安全问题（政治、军事领域等）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经济、生态领域等），基于安全保障维度可分为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就生存安全而言，国家安全可区分为物理层面的生存安全和精神层面的本体安全。

国家的生存安全（survival security）是最具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国家安全，旨在维护国家作为主权实体而存在，是国家“免于灭亡”的最低需求。在本文中，国家的生存安全被界定为国家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与基本国家功能等事关国家

<sup>①</sup> 刘跃进、王啸 《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演绎》，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

存续的主要维度方面免受“存在性威胁”（*existential threats*）的状态与保障能力。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范式和流派均论及国家的生存安全，尽管论述视角不尽相同，但都强调其根本性。现实主义范式将生存安全置于理论体系的核心位置。例如，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迫使国家将生存作为首要目标，通过权力积累与均势策略确保主权存续<sup>①</sup>。结构现实主义进一步系统化这一命题，认为在自助体系中的国家为确保自身的生存必然陷入“安全困境”<sup>②</sup>。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国家需通过自助机制应对外部威胁，包括军事防御与经济自足能力的构建<sup>③</sup>。这种基于物质主义安全观的理论在冷战时期达到巅峰，表现为核威慑理论与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的实践形态<sup>④</sup>。自由主义范式拓展了生存安全的内涵边界。例如，复合相互依赖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使生存安全突破军事维度，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等非传统要素构成新型生存威胁<sup>⑤</sup>。建构主义范式认为，国民对“国家”观念的集体认知构成生存的深层支撑<sup>⑥</sup>。国家为提升生存保障会主动参与规范内化与制度博弈，小国通过加入联合国增强生存合法性<sup>⑦</sup>。深受英国学派影响并与建构主义共享本体论基础的哥本哈根学派，以布赞等人的研究为代表，将安全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过程，将生存安全区分为军事、政治、经济、社

① [美] 汉斯·摩根索 《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杨岐鸣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68 页。

②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g Grove: Waveland Press, 2010, pp. 102–104.

③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0~36 页。

④ [美] 托马斯·谢林 《冲突的战略》，赵华译，华夏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9~52 页。

⑤ [美]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第 4 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2~70 页。

⑥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 402;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 Williams, “Broadening the Agenda of Security Studies: Politics and Method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0, Supplement\_2, 1996, p. 242.

⑦ Jan Hornat, “Survival and Status in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Grantors of Recogni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27, No. 1, 2024, pp. 95–115.

会与环境五个相对独立但相互关联的领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存在性威胁”概念<sup>①</sup>，以表明在常规政治程序之外对安全议题采取行动的正当性。

为增强跨案例比较的可操作性，本文将国家的生存安全操作化为以下三个相互关联且可在政策文本与实践中的指标。第一，地缘暴露程度与军事压力水平。该指标主要考察一国在地理位置与军事环境上的脆弱性，包括是否与强敌直接接壤、战略纵深与关键通道的防御难度，以及周边军事活动的频度与烈度，如军演、空海域逼近、危机事件等。地缘暴露越高，军事压力越持续，小国越容易将外部风险理解为直接影响国家存续的底线问题。第二，防务能力与外部安全保障。该指标关注国家自身防务能力与动员潜力是否被决策层视为不足以单独应对高强度的外部安全挑战，以及在缺乏具有约束力的外部安全承诺时，这种能力短板是否被认为可能引发“不可承受后果”。在政策层面，这通常体现为安全部门对“不结盟、有限合作不足以提供可靠保障”的判断。第三，决策层对威胁性质的定性。通过分析国家安全战略、国防白皮书、政府声明及关键领导人讲话，考察决策层是否将外部压力视为涉及主权、领土或国家基本功能的存续性威胁，并由此启动对既有安全政策的重新排序。这一指标有助于区分安全议题是否真正越过政策“底线”，从而提高案例比较的可操作性与解释力。

国家的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超越了物理层面的生存，是国家在身份认同、文化价值、制度模式等非物质领域的安全。它对应的是国家“免于身份迷失”的深层需求，旨在保障国家的“身份存续”与“价值延续”。国家的本体安全可界定为国家通过维持自我叙事与角色关系管理的持续性焦虑，从而保持相对于外部世界的意义与行动能动性。“本体安全”概念最初由英国精神病学家莱恩提出<sup>②</sup>，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将其应用到社会学领域，强调本体安全是行为体

<sup>①</sup>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8, pp. 15-32;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ecurity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50-60; Barry Buzan, *Globalization, Security, and the Nation State: Paradigms in Transiti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pp. 177-197;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Macrosecritisation and Security Constellations: Reconsidering Scale in Securitisation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5, No. 2, 2009, pp. 253-276.

<sup>②</sup> Ronald David Laing, *The Divided Self: An Existential Study in Sanity and Madnes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p. 39, p. 44.

通过日常惯例和社会互动维持“稳定的自我认同”及“基本信任系统”的心理机制<sup>①</sup>。米岑等国际关系学者在 21 世纪初引入该概念，将其分析对象从个体提升至国家，探讨国家身份与行为的关系<sup>②</sup>。国家被理解为置身于社会关系与规范结构的行动者，不仅追求免于物理毁灭的安全，也追求其身份叙事的连贯性、角色定位的稳定性以及互动关系的可预期性。总之，与生存安全侧重主权、领土与基本国家功能免于物理层面的存在性威胁不同，本体安全强调“我是谁”“我属于谁”“我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这些身份及关系问题的稳定性。前者关切风险的物质后果，后者关注风险的意义结构与情感后果。

为避免本体安全沦为泛化的“身份因素”，本文将其限定并操作化为以下三个可观察的维度。第一，身份叙事与他者建构的强度与连贯性。该指标关注国家精英如何通过历史记忆、文明归属与他者化框架构建“我们是谁”的叙事，此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38~61 页。

② Jennifer Mitzen,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2, No. 3, 2006, p. 346; Brent J. Steele, “Ideals That Were Really Never in Our Possession: Torture, Honor and US Ident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2, No. 2, 2008, pp. 246–261; Jennifer Mitzen, “Anchoring Europe’s Civilizing Identity: Habits, Capabilities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13, No. 2, 2006, pp. 270–285; Filip Ejdus, “Critical Situations, Fundamental Questions and Ontological In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21, No. 4, 2018, p. 19; Catarina Kinnvall and Jennifer Mitzen, “Anxiety, Fear,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Thinking with and Beyond Gidden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 12, No. 2, 2020, pp. 238–239; Vincent Della Sala, “Ontological Security, Crisis and Political Myth: The Ukraine War and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45, No. 3, 2023, pp. 361–375; Christopher S. Browning, “Geostrategies, Geopolitics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the Eastern Neighbourhoo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New Cold War’”,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62, 2018, pp. 106–115; Catarina Kinnvall, “Globalization and Religious Nationalism: Self, Identity, and the Search for Ontological Securit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5, No. 5, 2004, pp. 741–767; Resende, Erica, and Dovile Budryte, *Memory and Traum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p. 31–35; Brent J. Steele and Alexandra Homolar, “Ontological Insecur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Contemporary Populism”,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2, No. 3, 2019, pp. 214–221; 李格琴《本体安全理论介入国际政治研究及其创新价值》，载《太平洋学报》2010 年第 1 期；贺刚《国际关系的本体性安全研究：一项研究议程》，载《太平洋学报》2014 年第 12 期。

类叙事是否在战略文件、领导人讲话与公共政治中反复出现并保持相对一致，是衡量本体安全关切强弱的重要依据。第二，既有政策角色与惯例的稳定性<sup>①</sup>。国家在长期的国际互动中会形成并习惯于某种特定角色，如“永久中立国”或“欧洲一体化核心成员”。当外部环境剧变时，这种角色定位与政策惯例是否仍被国内主导性政治力量与公众视为可信且可持续。如果既有角色无法提供足够的确定性，甚至本身成了焦虑的来源，那么本体不安全感就会上升，从而催生对一种新的制度性身份的强烈偏好。第三，外部承认与文明归属的正当性需求<sup>②</sup>。对中小国家而言，国际社会的承认与明确的制度归属本来就是安全感的根本来源。小国对外部承认与“被保护的确定性”尤为敏感，北约与欧盟不仅提供能力与承诺，也提供身份与地位的确认；当对“被遗弃”或“被重新划入某种势力范围”的深层焦虑成为社会共识时，加入某个共同体就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本体安全价值。

### （三）分析模型与研究假设

基于前述概念操作化，本文提出一个“临界—强化”的二元解释机制，用以阐释欧洲小国在北约扩员背景下的差异化选择。该机制关乎国家生存安全的临界效应：当外部威胁被决策层感知为触及国家生存的底线时，安全议题会跃升为压倒一切的优先议程。在此临界状态下，小国势必重新评估其中立或有限合作等既有政策的有效性。一旦这些政策或制度安排的脆弱性（如成本）过高或可靠性（如安全承诺可信度）不足成为决策层的共识，加入已有的同盟体系（如北约）或建立新的同盟便会突破政策选项的临界点，从而实质性改变该小国对北约的政策。此外，该机制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也涉及本体安全的强化与定向功能。本体安全叙事为选择北约这类高度制度化的同盟赋予内在正当性，不仅强化了小国的结盟动机，也提升了其推进相关政策的确信性与连贯性。

在上述解释机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欧洲小国对北约的政策选择分析模型，国家的生存安全、本体安全和决策者的相关认知共同解释了小国在应对外部安全威胁与建构内部认同的互动中的战略行为逻辑。第一，生存安全是主导变量，解释“小国是否必须将结盟纳入政策选项”这一门槛问题。只有当外部安全威胁被决策层判定为触及主权与国家基本功能的存续性风险，且现有中立或有限合作

<sup>①</sup> Jennifer Mitzen, “Anchoring Europe’s Civilizing Identity: Habits, Capabilities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13, No. 2, 2006, pp. 270–285.

<sup>②</sup> 曾向红、陈明霞 《论国家的承认安全》，载《国际安全研究》2024 年第 1 期。

安排被视为不可靠时，加入集体同盟才会成为政策选择。第二，本体安全扮演干预变量的角色，仅在生存安全压力达到一定水平后才被激活，并对政策选择的方向与强度产生强化或抑制作用。第三，决策层的认知是中介变量，它是连接安全威胁与政策选择的关键环节。小国对外部威胁的识别并非简单的自动反射，而是经由决策层对威胁性质、承诺可信度以及替代方案成本的加工、权衡与筛选，最终转化为具体政策。第四，小国是否加入北约的政策选择是因变量。它是生存安全和本体安全经由决策者的认知和权衡产生的决策结果。

基于上述分析模型，本文提出以下三个研究假设，并围绕关键政策节点、精英语言与制度实践展开过程追踪，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进行验证。需要说明的是，“临界—强化”机制中的“临界”指小国的决策者是否将存续性外部安全威胁界定为国家生存威胁，这是政策的临界点。而“强化”并不等同于对结盟的单向推动，而是指在生存安全门槛被触发后，本体安全通过身份叙事与正当性资源对政策路径的确定性与动员强度产生放大效应：它既可能强化中立路径的持续性（表现为抑制结盟），也可能强化入盟路径的不可替代性（表现为推动结盟）。

假设 1：小国决策层未将外部安全威胁界定为触及国家存续威胁时，结盟选项难以进入政策议程，该国不采取结盟政策。

假设 2：小国面临存续性外部安全威胁但决策层未将其界定为国家生存威胁时，如果小国的本体安全威胁较低，其结盟动机将受到抑制，倾向采取维持非结盟或中立政策；如果小国的本体安全威胁较高，其结盟动机显著增强，倾向采取结盟政策。

假设 3：小国面临存续性外部安全威胁且决策层将其界定为国家生存威胁时，无论其本体安全程度高低，该国都倾向采取结盟政策。

### 三 复合安全诉求下小国是否加入北约相关假设的案例检验

本文遵循“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比较思路，选取爱尔兰、奥地利、瑞典、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作为研究对象，并据安全临界与身份压力的组合将其置于上述三种假设情境加以考察。七个国家同为欧洲小国，均处于俄欧安全关系紧张与地区不确定性上升的大背景之下，但其对外部威胁的界定、国家身份叙事的稳定性以及对制度性安全承诺的依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符合本文研究假设的基本情况并具备可比性。这些案例既能够避免将

结盟简化为外部威胁的单一因素，也有助于更完整呈现复合安全诉求作用下小国选择加入北约与否的差异化路径。

### （一）生存安全威胁缺位与不加入北约：爱尔兰

对生存性安全威胁的感知程度是小国权衡是否加入军事同盟的核心前提。爱尔兰始终未将加入北约纳入国家安全战略选项，其政策选择与安全环境感知高度契合假设 1 的核心逻辑。下文将从地缘暴露度、构建防务体系、官方定性威胁三个核心指标，结合爱尔兰地缘格局、安全政策实践及官方战略文件，论证无生存性安全威胁对其加入北约动机的抑制作用。

第一，地缘位置。爱尔兰的地理区位隔绝了来自俄罗斯的生存性军事威胁。一方面，爱尔兰是位于欧洲西端和大西洋东岸的一个岛国，与俄罗斯本土及加里宁格勒州距离遥远，俄罗斯常规军事力量的有效投射范围大多难以覆盖。此外，爱尔兰的东侧为英国和欧洲大陆，德国、法国、英国等强国构成抵御东部安全风险的核心屏障；西侧背靠大西洋，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和加拿大与之关系友好。总之，这种“远距隔离”的地缘特征，使其避开了欧洲与俄罗斯潜在冲突的前沿地带。另一方面，距离爱尔兰更近的英国和法国与其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和友好的安全关系，欧盟成员国身份进一步加强了爱尔兰与欧陆国家的关系。因此，极低的地缘暴露度使爱尔兰无需加入北约以寻求集体防御庇护。

第二，防务能力与安全保障。爱尔兰的防务能力相对有限，但通过欧盟和北约的“和平伙伴计划”可获得多重外部安全保障。一方面，爱尔兰国防军规模较小，现役人员 7 557 名<sup>①</sup>，缺乏战略威慑力量。2024 年军费约占 GDP 的 0.2%，是欧洲国防预算最低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安全需求被欧盟的安全机制有效覆盖。作为欧盟成员国，爱尔兰深度参与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SDP）及相关合作项目<sup>②</sup>。此外，爱尔兰与英国达成领空防卫协议，由英国皇家空军承担爱尔兰领空警戒任务，进一步降低了对北约集体防务的依赖。这种“多重外部保障”模式使爱尔兰能够在不加入北约的情况下维持安全稳定，进一步削弱了加入

<sup>①</sup> “Defence Forces”. <https://www.oireachtas.ie/en/debates/question/2025-07-29/378/>, 访问时间: 2026 年 1 月 4 日。

<sup>②</sup>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https://www.ireland.ie/en/dfa/role-policies/international-priorities/peace-and-security/common-security-and-defence-policy/>, 访问时间: 2026 年 1 月 3 日。

北约的必要性。

第三，官方对威胁的定性。爱尔兰 2024 年发布的《国家风险评估》将其面临的主要风险归纳为混合威胁、网络攻击、基础设施脆弱性、能源安全等非传统领域<sup>①</sup>，通篇未提及“国家被入侵”“主权被颠覆”等生存性威胁，也未将外部军事压力列为核心风险。同年发布的《国防政策审查》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导向，明确防务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强化非传统安全领域”<sup>②</sup>，强调通过欧盟、联合国及北约和平伙伴关系等多边机制应对安全挑战。爱尔兰在最新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也未将俄罗斯列为直接威胁，而是强调“全球不稳定因素”的间接影响<sup>③</sup>，这与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在俄乌冲突后明确将俄罗斯视为生存威胁的战略文件形成对比。爱尔兰领导人的公开表态更直接印证了这一认知。总理马丁多次表示，爱尔兰无加入北约的计划，将始终坚守军事中立，仅愿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行动，拒绝加入针对特定国家的威慑部队。此外，爱尔兰长期奉行军事中立政策，仅在联合国授权下参与维和行动，防务聚焦于国际维和、本土治安、海上搜救等非战争军事行动，而非抵御国家层面的外部军事入侵。爱尔兰的中立政策得到国内广泛支持，2022 年民意调查显示，仅 29% 的爱尔兰民众支持加入北约<sup>④</sup>，远低于瑞典的 63%<sup>⑤</sup>。这种自上而下的威胁认知形成了稳定的安全政策共识，在出现颠覆性威胁认知变化之前，其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经过分析可知，爱尔兰的生存安全威胁未触及临界点，结盟议题尚未进入政策议程，因而本体安全未被激活为影响结盟选择的关键变量。

① Department of the Taoiseach, “National Risk Assessment 2024 – Overview of Strategic Risks”. <https://www.gov.ie/en/department-of-the-taoiseach/policy-information/national-risk-assessment-2024-overview-of-strategic-risks/>, 访问时间: 2026 年 1 月 3 日。

② Department of the Taoiseach, “National Risk Assessments”. <https://www.gov.ie/en/department-of-the-taoiseach/collections/national-risk-assessments/>, 访问时间: 2026 年 1 月 3 日。

③ “White Paper on Defence”. <https://assets.gov.ie/static/documents/white-paper-on-defence-august-2015.pdf>, 访问时间: 2026 年 1 月 3 日 “White Paper on Defence Update 2019”. <https://assets.gov.ie/static/documents/white-paper-on-defence-update-2019-9400840a-735c-452e-ace0-8ca59785ade7.pdf>, 访问时间: 2026 年 1 月 3 日。

④ “Defence Forces Review 2022”. <https://www.military.ie/en/members-area/members-area-files/defence-forces-review-2022-digital.pdf>, 访问时间: 2026 年 1 月 3 日。

⑤ “Mandatperioden 2018 – 2022”. [https://www.scb.se/contentassets/f50c4aa9ab8546848fc999bc65189580/me0104\\_2018i22\\_br\\_me09br2201.pdf](https://www.scb.se/contentassets/f50c4aa9ab8546848fc999bc65189580/me0104_2018i22_br_me09br2201.pdf), 访问时间: 2026 年 1 月 3 日。

## （二）传统中立国的政策选择分化：瑞典与奥地利

瑞典和奥地利都有长期保持军事中立的安全政策传统。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两国面临大致相同的地缘安全环境，但两者政策选择截然不同，这为检验本文小国安全诉求“临界—强化”机制中的第 2 条假设提供了比较案例。

### 1. 安全威胁的“议程化”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瑞典与奥地利均将安全议题显著前置，但“议程化”并不必然等同于将其视为国家的存续性威胁。

对瑞典而言，俄乌冲突爆发初期，该国政府仍表示“不打算申请加入北约”，强调通过既有合作机制应对安全环境变化。此时，外部安全压力虽已进入政策视野，但尚未被界定为必须改变现有制度归属的存续性危机。随着冲突持续升级，瑞典政府于 2022 年 3 月设立跨党派安全政策工作组，并在 5 月发布《安全环境恶化——对瑞典的影响》评估报告<sup>①</sup>，系统审视威胁性质、现有制度安排的可替代性以及制度性承诺的可靠性。这一阶段的关键变化，并不在于对威胁强度的简单再评估，而在于对安全选择正当性结构的重新界定：即在承认风险上升的同时，逐步将“成员身份”与“安全确定性”“角色清晰性”联系起来。在此过程中，“威胁进入议程”与“政策选择”同时存在。瑞典一方面强化对威胁的政治关注，另一方面通过工作组评估与制度论证将入约作为可被正当化的制度路径推入核心议程，而非简单的自动反射。

对奥地利而言，它同样承认俄乌冲突使欧洲安全环境恶化<sup>②</sup>。此外，奥地利自 1955 年《国家条约》宪法化以来所形成的中立传统具有较强的制度刚性，其政策讨论更多聚焦于在欧盟框架内加强风险管控与韧性建设<sup>③</sup>，而非寻求根本性的结盟转向。2022 年 5 月，奥地利外长重申中立“将继续存在”<sup>④</sup>。此类表态意

<sup>①</sup> “Deterioration of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Implications for Sweden Ds 2022: 8”. <https://www.government.se/contentassets/05ffb51ba6404a459d7ee45c98e87a83/deterioration-of-the-security-environment---implications-for-sweden-ds-20228/>，访问时间：2026 年 1 月 14 日。

<sup>②</sup> Dejan Stokovic & Marko Golubovic, “The Impact of the Russian Invasion on Ukraine on Neutrality in Europe: The Case of Sweden, Finland, Austria and Serbia”, *International Problems*, Vol. 77, No. 1, 2025, pp. 63–89.

<sup>③</sup> 程卫东《大变局中的中立国路在何方》，载《人民论坛》2023 年第 14 期。

<sup>④</sup> “Austria’s Neutral Status Here to Stay, Foreign Minister Say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austrias-neutral-status-here-stay-foreign-minister-says-2022-05-18/>，访问时间：2026 年 1 月 19 日。

味着奥地利并非否认外部安全压力，但倾向于将其限定为可以通过与欧盟的外交与有限安全合作处理的风险议题，从而使加入北约难以在议程上成为压倒性的必要性叙事。需要强调的是，这一阶段的比较分析并不要求两国的安全威胁强度完全对等，而是确认两国均已进入“生存安全压力被感知”状态，安全议题成为高位议程，但尚不足以在两国同时形成国家存续性安全威胁结论。

## 2. 生存安全威胁已入场但尚未确定为存续性威胁

第一，地缘暴露程度。瑞典与奥地利的地缘环境虽有不同，但两国面临的外部安全压力均未达到引发“存续性危机”的认知程度。瑞典不与俄罗斯接壤，却处于从波罗的海进入大西洋的关键水域，对区域军事态势与海空战略通道更为敏感。其地缘暴露更多表现为区域安全不确定性与潜在外溢风险上升，而非对领土的直接威胁。奥地利作为欧洲内陆国，与俄罗斯不接壤，且与俄罗斯之间存在多个北约成员国构成的天然战略缓冲带，地缘暴露程度远低于瑞典。同时，奥地利作为欧盟成员国，深度融入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框架，这为其提供了一个区别于北约的集体安全机制的替代选项，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寻求加入北约的紧迫性。总之，地缘差异未将两国推入截然不同的威胁区间，两国在俄乌冲突初期均未将自身明确置于“迫近入侵”语境之中，因而地缘暴露度更像是解释政策辩论升温的背景条件，而不足以单独解释结盟与否。

第二，防务能力与外部安全承诺。两国均意识到单靠自身能力难以应对长期不确定性，但对外部制度承诺的必要性权重不同。瑞典在俄乌冲突后逐步将北约第五条的法律约束性集体防御承诺置于论证中心，强调伙伴合作与正式成员在承诺可信度上存在质差。这一判断并非源于“能力瞬间坍塌”，更像在安全风险上升情境下对“承诺确定性”的制度性偏好上升。奥地利长期将安全保障理解为多层组合，地缘缓冲、欧盟框架与有限安全合作共同构成其安全基础。奥地利的中立政策具有坚实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双重背书，形成了独特的“制度可靠性”<sup>①</sup>。在奥地利政府看来，放弃中立不仅导致法律与政治成本，还将削弱其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特影响力。同时，奥地利通过“和平伙伴关系计划”（PfP）深度参与北约框架下的安全合作，多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形成与北约独特的“有限合作”模式。这不仅强化了与西方盟友的安全联系，还通过非作战任务提升了国防能力。因此，两

<sup>①</sup> Kunz JL, "Austria's Permanent Neutr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0, No. 2, 1956, pp. 418-425.

国在俄乌冲突爆发初期都采取多种应对路径：强化国防、深化欧盟合作、维持伙伴关系等替代方案并未被排除，尚未出现“非结盟不可”的情况。

第三，定性安全威胁。瑞典与奥地利均将俄乌冲突视为对欧洲安全秩序的重大冲击，但其话语边界仍保留“风险—治理”的框架。瑞典政府在 2022 年春季经历了从“并不打算申请加入北约”到设立跨党评估、再到正式将入约表述为“最佳方式”的转折，显示其威胁认知并非一开始即界定为存续性威胁。奥地利更倾向于将俄乌冲突界定为需通过欧盟框架、外交与风险管控机制应对的系统性挑战，并多次重申其中立立场。俄乌冲突爆发后，奥地利官方和民间掀起一场是否要加入北约的讨论。奥地利外交部长沙伦贝格在 2024 年和 2025 年均表示没有加入计划，总理内哈默也指出奥地利的历史与芬兰、瑞典不同，不会改变中立立场。2025 年外长迈因尔—赖辛格进一步明确奥地利将保持中立。此外，奥地利民众也普遍未把俄罗斯视为直接军事威胁，且民众大多支持中立政策。

### 3. 本体安全的强化/抑制作用

在瑞典和奥地利的生存安全威胁处于“能够被感知到但尚未极化”的情景下，真正能解释两国对加入北约政策分化的是本体安全威胁的强弱及其叙事指向。

第一，身份叙事连贯性。瑞典的军事不结盟具有历史延续性，但冷战后其安全实践与西方安全共同体的制度性合作不断加深，使不结盟标签与实际安全行为之间逐渐积累张力。俄乌冲突背景下，这种张力更容易被放大为“叙事不连贯”：一方面需要更深度的制度协作以获得安全确定性，另一方面又要维持“不结盟”的身份表述，从而导致政策正当性需要重新缝合。对奥地利而言，中立政策已内化为国家本体安全和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要害。中立国身份不仅是外交政策，更是基于 1955 年“国家条约”及宪法确立的二战后国家重建根基、国际社会承认的“桥梁国家”角色象征。尽管俄乌冲突冲击欧洲安全秩序，奥地利国内并未出现对其“国际承认的中立地位”的系统性质疑。奥地利在俄乌冲突后并非没有讨论，但其官方立场在关键节点上倾向于重申中立。2022 年 5 月外长强调继续中立，并指出奥地利情境不同且中立拥有强大社会支持<sup>①</sup>。

第二，角色稳定性。瑞典长期自视为“负责任的西方国家”与“地区安全

---

<sup>①</sup> “Austria’s Neutral Status Here to Stay, Foreign Minister Say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austrias-neutral-status-here-stay-foreign-minister-says-2022-05-18/>, 访问时间: 2026 年 1 月 13 日。

贡献者”，其政策实践与北约国家高度重叠，但制度层面处于非成员位置。这种“实践中心—制度边缘”的错位，在安全风险上升时更易触发角色不稳定感，国家角色与制度归属缺乏一致性，导致继续维持模糊地位的政治成本上升。瑞典长期深度参与西方安全合作，但在关键的制度身份上缺乏正式成员资格所带来的确定性。奥地利将“中立调解者”“桥梁国家”作为核心角色资源，该角色与不加入军事同盟高度兼容，并在国际组织与外交实践中获得持续强化，安全环境变化并未使其角色定位出现结构性失配。在奥地利，任何放弃中立的举动，都会被国内主要政治力量和公众解读为对国家根本身份与历史角色的背叛，可能引发高昂的身份认同断裂成本与社会分裂风险。

第三，承认需求。瑞典在对俄政策上与北约国家保持一致。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瑞典政治精英将“加入北约”塑造为在变局中“捍卫主权、安全与西方价值观”的连续性选择，呼应了其社会寻求一个更确定、更牢固的“西方归宿”的集体心理。如瑞典政府将加入北约明确界定为“保护瑞典安全的最佳方式”<sup>①</sup>。成员身份不仅意味着文明归属，更意味着获得清晰、可预期的安全承诺与制度归属。哥德堡大学 SOM 研究所的研究表明，瑞典公众对北约的看法在 2021~2022 年出现“历史性转变”，正面评价上升至 64%，负面仅 14%<sup>②</sup>。民意支持率的转变本身就印证了将北约成员身份塑造为一种更高级别的“制度归属”与“承认”叙事的成功。奥地利国内民众对中立国身份的认同度极高，这使奥政府保持中立政策具有稳固的民意基础。2024 年的一项民调调查显示，仅有 14% 的奥地利民众支持加入北约，反对加入北约者达 74%<sup>③</sup>，这意味着任何改变政策的尝试都面临国内政治阻力。对奥地利而言，中立已高度内化为国家身份与角色叙事的核心资源，因而对结盟动机产生抑制效应。

#### 4. 政策选择的分化

在上述条件共同作用下，俄乌冲突爆发后瑞典迅速开启加入北约的进程。

<sup>①</sup> “Statement of Government Policy”. <https://www.government.se/globalassets/government/dokument/utrikesdepartementet/statement-of-foreign-policy-2022.pdf>, pp. 1-10.

<sup>②</sup> “Opinion on NATO: Record Shift between 2021 and 2022”. <https://www.gu.se/en/news/opinion-on-nato-record-shift-between-2021-and-2022>, 访问时间: 2026 年 1 月 13 日。

<sup>③</sup> “Neutralität: Die Hoffnung, Dass Alles Gut Wird”. <https://www.gallup.at/de/newsroom/umfragen/2024/neutralitaet-die-hoffnung-dass-alles-gut-wird/>, 访问时间: 2025 年 1 月 20 日。

2022 年 5 月 18 日，瑞典政府正式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递交申请，标志其长期军事不结盟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向。6 月马德里峰会上，北约向瑞典发出加入邀请，但因土耳其就反恐等问题提出关切，瑞典加入北约一度受阻。为推进加入进程，土耳其、芬兰与瑞典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签署三方备忘录，瑞典承诺调整反恐立法、执法合作及武器出口等方面政策。2024 年 3 月 7 日，瑞典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递交加入文书，正式成为北约第 32 个成员国。

奥地利则因较低的本体安全威胁，更倾向于通过与北约的合作框架维持既有角色和维护国家安全。值得注意的是，俄乌冲突全面爆发后奥地利国内对是否加入北约的看法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经历了从摇摆、分化到最终固化的动态过程。一是政策摇摆期。奥地利虽在初期顶住压力拒绝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以恪守中立，但其安全认知亦受冲突外溢影响而产生波动。2025 年 7 月，外交部长迈因尔-赖辛格公开表示“中立本身无法保护我们”，称正考虑放弃永久中立原则并探讨加入北约的可能性<sup>①</sup>。二是民意分化与政治博弈期。2025 年 7~9 月，奥地利国内舆论呈现高度分裂，民调显示多数民众反对加入北约<sup>②</sup>，主张维持中立的自由党与支持加入北约的政党却形成对立。三是立场固化期。2025 年 9 月 14~15 日，外长迈因尔-赖辛格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明确宣布奥地利将坚守其中立传统，“不会再寻求加入北约”<sup>③</sup>。此举终结了前一阶段的政策辩论，标志着奥地利的中立立场在宪法原则、民意基础与政党共识支撑下重新确立。此外，尽管奥地利的中立身份叙事核心诉求在于不加入军事同盟、不允许外国驻军设基地，并尽量避免向冲突地区提供致命性军事支持，但不意味着奥地利拒绝一切安全合作。俄乌冲

① “Irgendwann Türmen Sich Die Säрге in Russland”. <https://www.welt.de/politik/ausland/article68834e7c0e680a76f4e95342/oesterreichs-aussenministerin-irgendwann-tuermen-sich-die-saerge-in-russland.html>, 访问时间: 2026 年 1 月 20 日。

② “Austria Is Torn over Age-old Question of Neutrality and NATO”. <https://www.defensenews.com/global/europe/2025/07/31/austria-is-torn-over-age-old-question-of-neutrality-and-nato/>, 访问时间: 2026 年 1 月 20 日。

③ “80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tatement by H. E. Ms. Beate Meinl-Reisinger Federal Minister for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Austria”. <https://www.bmeia.gv.at/oev-new-york/news/statements-and-speeches/2025/09/80th-session-of-the-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statement-by-he-ms-beate-meinl-reisinger-federal-minister-for-european-and-international-affairs-of-the-republic-of-austria>, 访问时间: 2026 年 1 月 20 日。

突爆发后，奥地利虽拒绝向乌克兰直接提供武器，但仍向乌方提供了约 1 万顶头盔和 9 000 件防弹衣。

瑞典与奥地利的案例表明，在生存安全压力已被感知但尚未极化的条件下，小国在生存安全维度上的差异不足以解释其结盟选择的分化。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本体安全，瑞典和奥地利的案例比较分析验证了研究假设 2。

为进一步检验小国安全诉求的“临界—强化”机制在双重高压情境下的适用性，下文将转入对波罗的海三国与芬兰的分析。相较于前述“威胁已入场但尚未极化”的范围，波罗的海三国与芬兰所处地理环境更容易将外部压力安全化为指涉国家存续的威胁，而波罗的海三国与芬兰面临的本体安全威胁又有所区别。具体而言，波罗的海三国的本体安全与国家建构、历史创伤、他者界定相互交织，芬兰的本体安全压力更集中于“实践中心—制度边缘”的角色错位与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当生存安全被安全化为存续性威胁且本体安全不同时，小国的结盟逻辑是否稳定成立？当生存安全威胁被安全化为国家存续风险时，结盟倾向在不同本体安全结构的小国之间呈现高度一致性，本体安全不再分化“是否结盟”，而主要塑造“如何结盟”。

### （三）生存安全威胁严重下加入北约：波罗的海三国与芬兰

如果外部安全威胁不再被理解为可通过风险管理或有限合作加以应对的问题，而是被小国决策层界定为可能动摇国家主权与基本功能的存续性威胁，那么该国的军事政策必然发生变化。波罗的海三国与芬兰虽存在诸多差异，但在各自的关键决策窗口期，均将俄罗斯相关安全压力视为存续性安全威胁，并据此将加入北约作为获取不可逆安全保障的必要制度选择。

#### 1. 安全议程的敏感化与威胁的底线化

波罗的海三国与芬兰在安全议程设置上具有共同特征，它们对外部安全威胁具有高度敏感性，并倾向于将相关风险迅速上移至国家安全议程的优先位置。

对波罗的海三国而言，独立以来其安全议程始终围绕“后苏联空间的不确定性”展开。它们的战略纵深有限、与俄罗斯及加里宁格勒飞地直接接壤，使任何外部军事动向几乎无需缓冲即可转化为国家层面的生存性问题。在这一结构性条件下，安全议题长期处于“前沿化”状态。俄乌冲突爆发并未改变这一基本认知，而是被三国进一步界定为“欧洲安全秩序的根本性断裂”，并通过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与精英话语将俄罗斯明确表述为“系统性、长期性威胁”，完成了决策层对外部安全威胁的感知和确认。

芬兰的安全议程虽在冷战后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但俄乌冲突成为其中明显的认知断裂点。俄乌冲突爆发后，芬兰的政策精英迅速将这场危机解读为欧洲安全秩序的“根本性断裂”，并将其与自身的历史创伤如 1939 年苏芬战争及延续的苏芬矛盾<sup>①</sup>和芬俄接壤逾 1 300 公里的现实<sup>②</sup>关联起来，将该事件解读为俄罗斯通过武力改变欧洲秩序，并据此重新评估自身的安全处境。在芬兰的官方安全评估中，俄乌冲突被明确界定为对芬兰主权与领土完整构成长期挑战的事件，使安全议题在短时间内跃升为国家议程的压倒性优先项<sup>③</sup>。

由此可见，尽管波罗的海三国与芬兰的安全议程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但均完成了将外部安全压力界定为不可忽视的存续性安全威胁这一认知转变。

## 2. 触发生存安全的“临界点”

在生存安全层面，波罗的海三国与芬兰均在各自决策窗口期跨越了“临界点”，即认识到仅依靠自身防务能力或有限合作机制，难以有效应对潜在的大国威胁。

第一，地缘暴露程度。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接壤，使其成为俄罗斯与北约对抗的前沿，安全环境高度脆弱。俄方在西部军区部署的先进武器系统和频繁的边境演习，被三国视为对自身安全的直接挑战。北约的快速反应机制和情报共享网络为三国提供了实时威胁预警和协同防御能力，这是任何独立防御体系无法比拟的。从地缘政治现实角度看，北约不仅是三国安全的保险，更是国家生存的必需。芬兰是欧盟所有成员国中与俄罗斯接壤距离最长的国家，漫长的边界线和苏芬战争的历史记忆使芬兰将俄乌冲突解读为对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生存性威胁。芬兰政府在 2022 年《安全环境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俄乌冲突是“对芬兰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系统性挑战”，使芬兰“直接暴露在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潜在影响

---

① 参见（俄）拜尔·伊林切耶夫《苏芬战争：1939~1940》，胡焯译，中国长安出版社，2014 年 5 月版；徐隆彬《有关苏芬战争的几个问题》，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 年第 5 期；王鹏辉《苏芬战争与芬兰对苏政策演变》，载《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6 年第 7 期。

② Prokkola, Eeva-Kaisa, and Juha Ridanpää, “New Geopolitics and the Finnish-Russian Border as a Marker of Territoriality”,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99, No. 1, 2022, pp. 1-2; Anna Michalski, Douglas Brommesson, Ann-Marie Ekengren, “Small States and the Dilemma of Geopolitics: Role Change in Finland and Swede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0, No. 1, 2024, p. 148.

③ “Government Report on Changes in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https://julkaisut.valtioneuvosto.fi/server/api/core/bitstreams/ffe15198-2b87-45f8-abcf-0ed3cf45de58/content>, 访问时间: 2026 年 1 月 20 日。

范围内”<sup>①</sup>。芬兰担忧若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受挫，其战略注意力可能转向北方，自身会成为俄罗斯的下一个潜在战略目标。

第二，防务能力与承诺评估。波罗的海三国与芬兰的防务能力均不足以抵御长期结构性威胁。波罗的海三国的军事资源有限，无法独立应对俄罗斯的潜在威胁。三国总人口不足 600 万，国防支出总和长期远低于北约 2% 的标准，有限的经济规模限制其有效提升军事能力。三国缺乏独立的防空系统和远程打击力量，外部安全承诺的缺失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困境。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虽能够提供部分支持，但缺乏强制执行力。相比之下，北约的军事一体化程度更高，其指挥结构和后勤网络确保了三国的防御需求被优先纳入联盟战略。此外，波罗的海三国无法独立获取全球情报资源，而北约的联合情报体系可以提供实时监测和威胁评估。北约的后勤支援网络如预置装备和战略运输使三国能够在危机中快速动员，这是独立防御无法实现的。就芬兰而言，尽管它长期保持较高的国防投入、实行广泛征兵制并拥有约 90 万预备役人员，但其决策层清醒地认识到本国防务能力存在难以突破的上限，无法单独应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正如总理佩特里·奥尔波所言，“俄乌冲突结束后，俄罗斯仍将是永久威胁”，其军事力量可能向芬俄边界及波罗的海方向转移，构成“直接挑战”<sup>②</sup>。此外，芬兰原有的安全安排包括与瑞典的双边防务合作及北约“增强型伙伴”关系，因缺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集体防务条款，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其可靠性受到质疑。这种“自助能力有限”与“外部保障不足”的双重困境，动摇了芬兰长期奉行的不结盟政策的有效性，使其意识到传统的中立政策在现代化战争中难以为其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

第三，决策层认知。波罗的海三国对俄罗斯的威胁认知来源于历史创伤，并因冷战后俄罗斯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而不断强化。三国自 1991 年独立后，始终将俄罗斯视为首要的安全威胁。2008 年俄格冲突及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三国领导人持续在国际场合警示俄罗斯的扩张主义，表明其安全焦虑显著加深。俄乌冲突的爆发被三国官方界定为欧洲安全秩序的“根本性断裂”和对本国主权的

<sup>①</sup> Government of Finland, “Government Report on Changes in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Helsinki: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of Finland”. <https://valtioneuvosto.fi/en/-/government-report-discusses-changes-in-finland-s-security-environment>, 访问时间: 2026 年 1 月 1 日。

<sup>②</sup> “Russia to Shift Forces to NATO’s Border after Ukraine Peace Deal, Leaders Warn”. <https://www.irishtimes.com/world/europe/2025/12/16/russia-to-shift-forces-to-natos-border-after-ukraine-peace-deal-leaders-warn/>, 访问时间: 2026 年 1 月 20 日。

“生存性威胁”。2023 年《爱沙尼亚国家安全概念》文件明确将俄罗斯定性为爱沙尼亚“最大且长期的安全威胁”，并指出其属于“生存性威胁”<sup>①</sup>。同时，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波罗的海三国受访者中均有超过七成认为俄罗斯构成主要安全威胁：爱沙尼亚 92% 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试图在邻国重新建立影响力”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sup>②</sup>，拉脱维亚 71% 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是欧洲安全的威胁”<sup>③</sup>，立陶宛 76% 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对其构成混合威胁”<sup>④</sup>。对芬兰而言，冷战结束初期它一度认为俄罗斯威胁降低，但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后芬兰开始重新评估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意图。克里米亚事件后，芬兰的所谓“哥特兰困境”认知进一步强化了其生存安全焦虑，认为一旦俄罗斯控制波罗的海战略要地，非北约成员国将无法获得第五条集体防御保障<sup>⑤</sup>。尽管 2016 年芬兰政府报告曾判断俄罗斯不敢对主权国家发动直接军事侵略<sup>⑥</sup>，但俄乌冲突颠覆了这一评估。2022 年 5 月，芬兰在其安全评估报告中明确表明，现有合作框架“既不能等同于、更无法替代北约的正式成员国地位”<sup>⑦</sup>，唯有获得北约法律约束下的不可撤销的集体安全承诺，才能应对其认定的长期生存性威胁。由此可知，芬兰申请加入北约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共同推动：一方面，芬兰公众对北约成员资格的态度出现了显著且迅速的转变；另一方面，芬兰精英阶层逐渐形成广泛共识，认为

①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of Estonia”，[https://www.kaitseministeerium.ee/sites/default/files/eesti\\_julgeolekupoliitika\\_alused\\_eng\\_22.02.2023.pdf](https://www.kaitseministeerium.ee/sites/default/files/eesti_julgeolekupoliitika_alused_eng_22.02.2023.pdf)，访问时间：2026 年 1 月 2 日。

② “Public Opinion on National Defence 2025”。[https://www.kaitseministeerium.ee/sites/default/files/public\\_opinion\\_on\\_national\\_defence\\_2025\\_kantar\\_emor\\_0.pdf](https://www.kaitseministeerium.ee/sites/default/files/public_opinion_on_national_defence_2025_kantar_emor_0.pdf)，访问时间：2026 年 1 月 20 日。

③ “Security Radar 2025: Latvia”。<https://baltic.fes.de/topics/foreign-security-and-defence-policy/security-radar-2025-latvia.html>，访问时间：2026 年 1 月 20 日。

④ “Public Opinion Poll: Lithuania Trusts the Armed Forces, Our Allies and would Take Part in Armed Defence of the Country”。<https://kam.lt/en/public-opinion-poll-lithuania-trusts-the-armed-forces-our-allies-and-would-take-part-in-armed-defence-of-the-country/>，访问时间：2026 年 1 月 20 日。

⑤ Jonny Lindfors, “Gotland: A Nordic Defense Dilemma”。<https://warroom.armywarcollege.edu/articles/gotlanddilemma/>，访问时间：2026 年 1 月 1 日。

⑥ “Mats Bergquist *et al.*, “The Effects of Finland’s Possible NATO Membership”。[https://um.fi/documents/35732/48132/the\\_effects\\_of\\_finlands\\_possible\\_nato\\_membership/c206b3c2-aaaa-5809-c545-7aa67c9beb2a?\\_t=1525861455616](https://um.fi/documents/35732/48132/the_effects_of_finlands_possible_nato_membership/c206b3c2-aaaa-5809-c545-7aa67c9beb2a?_t=1525861455616)，访问时间：2026 年 1 月 1 日。

⑦ Ibid.

在俄罗斯威胁能力上升的背景下，芬兰既有安全安排已难以有效应对，而加入北约被视为几乎唯一可行的补救路径<sup>①</sup>。

### 3. 本体安全差异与结盟正当化

在生存安全突破临界点的情况下，本体安全并未在波罗的海三国与芬兰谋求加入北约方面产生分化，却塑造了它们结盟的正当化路径与动员方式。

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后，其本体安全建构的核心在于彻底重构国家身份认同，并以此为基础塑造了高度连贯且持续强化的政策一致性。一方面，沉重的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创伤难以消除，导致它们对俄罗斯深刻的不信任，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同时，三国政治精英将“回归欧洲”确立为国家身份的根基<sup>②</sup>。他们通过将1940年苏联兼并定性为“非法占领”、持续纪念“波罗的海之路”等历史记忆政治手段，以及在法律与教育领域推动去俄化、修订教科书、强化本国语言政策，切割与苏联的历史纽带，重塑以“欧洲性”为基础的国家认同<sup>③</sup>。2007年4月26日，爱沙尼亚政府将坐落于首都塔林市中心的苏军解放塔林纪念碑和红军铜像拆除<sup>④</sup>。2015年7月20日，立陶宛政府以安全原因为理由下令拆除首都维尔纽斯一座桥上的苏联时期的雕像<sup>⑤</sup>。2025年2月8~9日，波罗的海三国彻底切断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的电网连接并同步接入欧洲电网<sup>⑥</sup>。另一方面，重构身份叙事并将外部威胁“安全化”。三国将俄罗斯描述为“噬土成性”的威胁源，通过强调俄罗斯的“侵略性”巩固内部团结和外部支持。这种身份叙事成功地将欧盟与北约塑造为“我者”，将俄罗斯建构为制度与文明上的“敌对的他者”，并将加入北约与欧盟视为他们完成“文明回归”、获得西方完全

① Matti Pesu, Tuomas Iso-Markku, “Insufficiency of Informal Alignment: Why did Finland Choose Formal NATO Membership?”,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0, No. 2, 2024, pp. 569–588.

② 曹鹏鹏 《联盟转型与小国追随战略评估——以波罗的海三国对北约追随战略为例》，载《国际观察》2019年第2期。

③ 梁强 《“身份认同”与“安全两难”——加入北约和欧盟后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3期。

④ 《爱沙尼亚拆除苏军解放塔林纪念碑 俄罗斯反应强烈》，<https://news.cctv.com/xwlb/20070428/105934.shtml>，访问时间：2026年1月2日。

⑤ 《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日这天，立陶宛一市决定拆除苏联战士纪念雕塑群》，<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6422848180968884&wfr=spider&for=pc>，访问时间：2026年1月1日。

⑥ 张艳璐 《波罗的海三国切断“最后的苏联系统”》，载《世界知识》2025年第6期。

承认的根本标识。这种身份叙事为其拒绝加入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转而寻求融入西方体系提供了内在正当性。

芬兰的本土安全威胁更多体现为制度归属与国家角色一致性的张力。传统的军事不结盟政策是其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务实选择，而非不可变更的国家身份内核。该国地处欧洲文明与俄罗斯影响力的交汇点，地缘文化上的“边缘性”催生了其寻求明确西方归属的身份动力。冷战结束后，融入西方、强化“欧洲国家”认同逐渐成为芬兰精英与社会的共识。俄乌冲突爆发后，芬兰强调这是对安全环境变化的制度升级与角色一致性修复，而非对国家身份的根本性重塑。芬兰国内民意在短时间内对北约认知的显著变化，进一步为这一正当化叙事提供了社会基础。2022 年 5 月，芬兰政府正式提交加入北约的申请时，民调显示超 70% 的芬兰人支持加入北约，远高于冲突前的 26%<sup>①</sup>。在上述机制作用下，两类国家都采取了加入北约的政策。波罗的海三国于 2004 年加入北约并完成制度性嵌入，其后长期以“前沿国家”角色强化联盟依赖。芬兰在 2022 年 5 月提交申请并于 2023 年 4 月成为正式成员，完成了从军事不结盟到成员国的快速转变。这表明，当外部威胁被决策者界定为国家存续风险时，小国面临的本土安全威胁无论大小，均将结盟视为必要的制度选择。本土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并非毫无影响，而是由分化“是否结盟”的变量转化为塑造“如何结盟”与“如何确定”的条件性因素。由此，假设 3 也得到了验证。

## 结 语

本文以小国的安全诉求为研究视角，尝试构建以临界—强化机制为核心的分析模型，解释欧洲小国面对不同安全威胁时关于是否加入北约的政策逻辑。本文并非否认大国在北约扩员中的结构性影响，而是在“大国主导论”解释视角下补足小国能动性的微观机制。这一研究视角的合理性在于，任何国家在对外政策上都有其主观能动性，北约扩员的进程及方式不仅受大国的推动和主导，也会受

<sup>①</sup> Finnish Government, “Government Report on Changes in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Helsinki: Finnish Government, 2022)”. [https://julkaisut.valtioneuvosto.fi/bitstream/handle/10024/164002/VN\\_2022\\_20.pdf](https://julkaisut.valtioneuvosto.fi/bitstream/handle/10024/164002/VN_2022_20.pdf) “Yle Poll: Support for NATO Membership Soars to 76%”. <https://yle.fi/a/3-12437506>, 访问时间: 2026 年 1 月 1 日。

到小国态度的影响。小国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外部安排，其对安全威胁的界定、身份归属的理解与承诺可信度的认知，能够在特定条件下与大国战略发生融合并转化为制度性结果。

为了使研究更具科学性与说服力，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小国安全诉求的“临界—强化”机制的分析模型，基于此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并通过多个案例进行比较分析与验证。研究表明，三组案例验证了相应的研究解释。可以说，本文的研究超越了对北约扩员这一历史进程的个案解释，涵盖了欧洲小国是否加入北约的各类情况，为理解当前欧亚地缘政治变局中小国的军事安全政策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察视角。对于区域安全治理与大国互动而言，该框架的启示在于：一方面，单纯提供经济收益或有限的安全合作，难以化解那些已将外部安全威胁上升至“存续性安全”的小国的战略焦虑，有效的区域安全架构需包含具有较高可信度的制度性承诺。另一方面，大国在争取小国支持或至少是中立的竞争中，不仅需要考量物质利益的让渡，更需重视小国的“本体安全”诉求，即其对身份认同、国际尊严与历史叙事的内在需求。对于中国而言，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与中亚、东欧等小国的合作不应仅局限于项目合作与经济回报层面，而应更敏锐地回应俄乌冲突后其显著上升的安全关切与身份定位，通过持久、可预期的良性互动帮助其形成并稳固“向东看”的集体认同，从而在分化加剧的国际环境中夯实信任基础与伙伴关系。令人感慨的是，二战后北欧国家凭借中立政策一度远离大国竞争中心，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长期被视为国际社会的“优等生”<sup>①</sup>；而今，随着芬兰与瑞典放弃长期奉行的军事不结盟立场并选择加入北约，这一传统战略定位已发生根本性调整。由此，北欧国家未来如何在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中重新寻求安全与自主之间的平衡，以及“中立国不再中立”背景下欧洲安全秩序的演进，均为值得持续关注和深入探讨的研究议题。

（责任编辑 张昊琦）

<sup>①</sup> 田德文 《“北欧神话”走向终结》，载《世界知识》2024年第5期。

policy. The 2023 version of its Foreign Policy Vision significantly restructured the priority order of its foreign cooperation regions , dropping the EU and the US from their previous top position ( second only to the CIS) to their lowest priority position ( second only to Antarctica) . With this new shift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 Russia is accelerat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AEU and other countries 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 and continuing to strengthen the EAEU’s internal integration mechanisms to counter external pressure from US and EU sanctions.

**Key Words:** Russia’s Foreign Policy , EAEU , Regional Integration ,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 Russia–Ukraine Conflict

### **Survival Security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The Policy Logic of Small European Countries Joining NATO** **Sun Xihui and Deng Shiqin**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 the European security order has undergone accelerated restructuring , and NATO expansion has once again become a focus of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Existing research largely stems from the “great power determinism” approach , emphasizing the structural role of US dominance or the US–Russia rivalry , relatively neglecting the agency of smaller states in defining threats , mobilizing their identity , and choosing institutional options. This paper takes a smaller state perspective ,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survival security and existential security , constructing a criticality–reinforcement explanatory mechanism that combines phased and conditional elements , and proposing relevant research hypotheses. This paper uses Ireland , Austria , Sweden , the Baltic states ( Estonia , Latvia , and Lithuania ) , and Finland as examples , conducting tests based on comparison and process tracking methods. The Irish case demonstrates that when external threats are not defined by policymakers as threats to national survival , alliances are difficult to incorporate into the policy agenda. The cases of Austria and Sweden demonstrate that when existential security threats are perceived by policymakers but not defined as threats to national survival , ontological security strengthens Sweden’s motivation for alliance and pushes it towards NATO membership. Austria , on the other hand , maintains a neutral policy due to the restraining effect of ontological security. The cases of the Baltic states and Finland reveal that when external threats are defined by policymakers as threats to national survival , small states tend to form alliances regardless of their ontological security situation.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policy logic behind whether small states seek NATO membership under the intertwining of survival pressur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 supplementing the small state explanation path of NATO expansion.

**Key Words:** NATO Expansion , Survival Security , Ontological Security , European Security Order , Alliance Policy of Small States